

吴县党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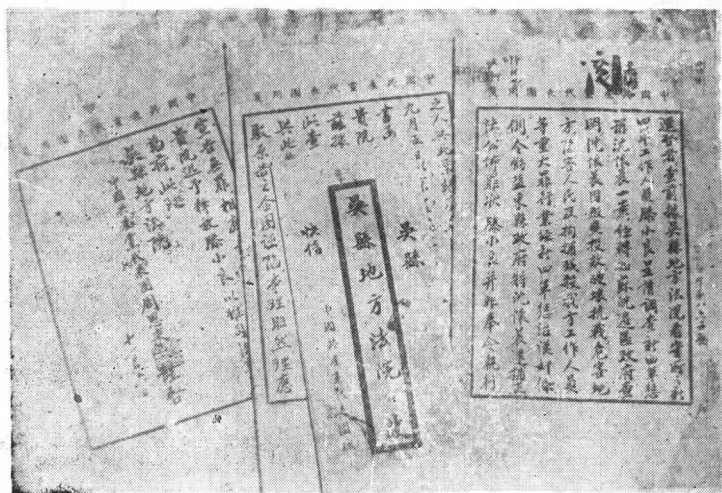
第一辑

中共吴县县委

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周恩来同志为营救李觉等同志致邵力子先生的信；
左上，当时国民党《锡报》刊登的新闻。



周恩来同志为营救滕小良同志致吴县地方法院的信

贈于 1998.9.10 時

目 录

我党苏州独立支部的情况·····	徐镜平 (1)
吴县早期农民的抗租暴动·····	(4)
有关金家风的一些情况·····	葛蔚平 (9)
灵岩山下百日烽火	
——回忆抗战初期木渎青年的抗日宣传活动·····	凤永益 (10)
太湖·····	王香雄 (14)
回忆苏西的抗日斗争·····	孙幸录 (17)
苏西地区党组织情况·····	<u>许英</u> (23)
回忆在苏西地区开展秘党工作的情况·····	<u>李希之</u> (25)
抗日时期在锡南苏西工作的点滴回忆·····	李锐 (30)
在反“清乡”斗争中五十二团开辟苏西的情况·····	张 鏊 (36)
从锡南到苏西敌占区做秘密工作的经过·····	肖 洛 (45)
太湖苏西地区反“清乡”斗争·····	薛永辉 (51)
1943年到1945年坚持苏西斗争的情况·····	张文龙 (64)
太湖冲山被围记·····	严月落 (73)
抗战时期我军开辟洞庭东、西山的经过·····	徐亚夫 (84)
坚持苏西斗争的片断回忆·····	张振东 (94)

在吴县西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回忆·····	赵建平	(108)
1936年至1941年在江南敌后工作时期·····	[王承业]	(117)
夜袭浒墅关的侦察前后·····	李关玉	(120)
“江抗”夜袭浒墅关回忆·····	吴立夏	(123)
在“小苏北”地区开展秘党工作·····	马克强	(125)
在渭黄地区和漕湖两岸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	钱冰	(130)
回忆在漕湖地区和交通线上的斗争·····	钱茂德	(142)
漕东地区革命斗争的回忆·····	王彬南	(153)
王家庄事件·····	张荃	(163)
1940年7月至1941年底苏锡地区一些情况的回忆·····	徐野	(165)
回忆开辟东桥区的工作经过·····	王中一	(171)
我在东桥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	俞竹君	(178)
“小苏北”地区的斗争和周恩来同志营救我们的 情况回忆·····	李觉	(181)
抗战初期成立苏州县委的前后经过·····	翁迪民	(189)
抗日战争时期阳澄湖地区革命斗争的回忆·····	沈鲁钊	(203)
我知道的阳澄湖地区的革命斗争·····	张梅	(214)
关于阳澄湖地区的斗争·····	汪良	(218)
陈鹤烈士传略·····		(225)
后记·····		(232)

我党苏州独立支部的情况

徐镜平

我是宁波人，是在宁波入的团。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告一段落后，我们预备考大学但是错过了时间。我便由张秋人同志介绍，认识了侯绍裘同志，我和侯绍裘一起去苏州乐益女中，同时去的还有沈志远的两个妹妹沈蔼春和沈联春。我当时到乐益是组织上决定的，到了苏州后我便转为党员。

我是到了乐益女中后，才认识叶天底、王芝九、张闻天、张世瑜等人的，他们也都是党员。侯绍裘的弟弟侯绍伦也在，他当时不是党员。

乐益女中的校主叫张冀牖，他比较开明，是国民党左派。张冀牖以前请过一个国民党员陈德徵来管学校，据说陈很腐化，把学校搞得乱七八糟，风气很坏，张冀牖不要陈搞了，聘请侯绍裘到乐益。当时侯绍裘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威信很高，在松江和上海主持景贤女中，又是上海大学附中的负责人，这些学校为我们党培养了不少男女干部。他作风正派，工作积极，一点官气也没有。张冀牖慕名要他来整顿乐益。张冀牖和校长韦钧一平时不大来校，张的几个女儿都在乐益读书。

当时我们的分工是，侯绍裘当校务主任，他平时忙得很，经常跑上海、南京、松江等地，党务工作很多。我是学校的训导主任，兼教英语，张闻天教英语，张世瑜教数学，王芝九负责教学行政(可能是教务主任)兼教语文，叶天底教语文兼美术，侯绍伦教体育。

苏州的党团组织是我们去后才建立起来的，组织的名称叫独立支部，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支部为叶天底、侯绍裘、张闻天、张世瑜、王芝九和我六个人。支部书记是叶天底，支部委员三个人，组织委员是叶天底兼，我是妇女委员，张闻天可能搞宣传。叶天底到乐益比我们要早，听他讲起过陈德微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时候来的就不大清楚，可能是上个学期已经到乐益任教了。

关于苏州在我们去之前是否有过党组织，我的回忆在我们去之前是酝酿，有党员去活动过，但是没有成立组织，是我们去了以后才正式成立组织的。

张秋人也到苏州来参加过我们会议，是以什么身份来的不清楚，还有施存统（又名施复亮）、肖楚女、钟复光等都来过，他们常到苏州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象肖楚女就作过关于“关税问题”的演讲，听讲的群众面很广，有工人、店员、小业主、资本家，激起了苏州反帝反封建的热潮。那时我们经常到皇陵基附近的一个图书馆里活动，那里来往的人很多，我们在活动中物色发展了一批党团员。社会上的发展工作是由叶天底负责的。

张闻天、叶天底他们通过学校的各项活动，如开学典礼、纪念会等，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开展爱国宣传。

我们去了以后，学校的校风改变很大，学生们都很认真、正直，我们在学校里发展过组织，当时学生中发展的都是入的团。沈蒿春、沈联春姐妹俩原来就是团员，后来又发展了陈寄如、葛琴，还有个季漪飞（后来当了特务，我在重庆碰到过她）等人入团。另外还有几个积极分子，如王伊珠等。

当时吴县国民党的左派组织在知识分子和职员中较多。为了便于工作，我们独立支部的这批人都参加了国民党。我是到了苏州后加入国民党的，离开苏州后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还组织成立了各界妇女联合会筹备会。因为我们在学期结束后就离开了苏州，所以后来的妇女工作情况就不再过问了。

（苏州市党史办公室李彤访问整理）

吴县早期农民的抗租暴动

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西山、唯亭、斜塘、胜浦、车坊的农田普遍遭受旱、虫灾害，粮食基本无收。可是，催子报荒不实、不公，地主仍高成收租。广大农民饥饿难忍，恨之入骨，自发地聚众奋起，与地主、催子展开了抗租斗争。规模少则百余人，多至千人以上。斗争形式多样，如西山农民痛打地主蒋宗培和区长，唯亭农民英勇捣毁警察所，斜塘、车坊农民放火焚烧催子的房子、木船和船舫。

经过斗争，有的达到了降成减租，释放了在押农民，可贵的是点燃了抗租烈火，打掉了催子的威风，给了地主狠狠的打击。最后，农民的抗租暴动虽被地主与反动政府相互勾结弹压了，但农民奋不顾身、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西山农民痛打地主、区长

一九二九年(即民国十八年)，西山农田受旱，虫灾严重，白梢满田，产量低得可怜。据七十岁老农曹水泉回忆，他家四亩田，在正常年景，水稻亩产约五百斤，那年灾荒亩产仅收一百来斤，当时农家普遍只收百来斤。农民再三要求地主减为五成租，可是地主不顾农民死活，仍要高成收纳。东宅河的徐仲尧要收八成租，后堡的蒋宗培硬要收七成半租。由于议租不公，广大农民群情激愤，“共荒”的斗争就成为当时唯一的生路。

同一苦根生，心往一处去。马村凌桂友讲：“田里收不到，家里没有粮，还是去‘共荒’。”当时东河村的青年农民殷安才，

凭借挑卖黄豆芽之便，在元山、辛村、后埠、前湾、金村、东河等地宣讲：“地主不减租，还是起来‘共荒’的好。”农民们听了认为言之有理，都跃跃欲试。

就在民国十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冬至节那天，凌桂友、徐才发带领四五十个农民，到达后堡村，撞开了地主蒋宗培的家门，找米下锅，烧了二十斤米饭，把五斗米的冬至团吃个净光。事后蒋宗培去县府告发“共产”案。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又有农民四五百人，赤手空拳，再次涌入蒋家，要求免租。蒋宗培拒不答应。当时西山区长王淞保和西山公安分局局长郑伟业也在场，都不表态。立时在场的农民更加火上加油，燃烧着心头恨。辛村农民姚金才一把揪住了区长王淞保的头发，凌桂友把王抓出来用嘴咬，有的用指甲在王的脸上乱抓，把这个王区长抓得血痕满脸。公安分局局长郑伟业也被咬伤，狼狈不堪。迫于形势，王、郑不得不在逼租单上写上了“免租”两字。农民信以为真，就在下午四时散了队伍。

事后不久，县公安局长郑诚之（郑伟业的叔父）派了三、四只轮船下乡，抓“暴农”。当时就抓走了金福生、殷根宝、朱玉成、周掌法、杨仁根、徐才发、戚金福、凌桂友等人，在狱中受到老虎凳、灌火油等酷刑的折磨。地主强迫交租，农民痛苦万分，有的典卖了东西破了产还租，有的被地主收回了租田。

由于地主与反动政府互相勾结，农民受了骗，又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一场“共荒”抗租的斗争遭到了失败。

车坊农民怒烧催子房舍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车坊地区遭受蝗虫灾害，粮食歉收。农民捆了死稻，登门报荒，要求减免粮租，但催子无动于衷，不但不免，而且变本加厉，百般逼紧压榨，农民被逼得透不

过气来。在各地农民抗租风潮的影响下，车坊农民就自发地组织起来，勇敢地走上了抗租斗争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一天下午，约在三四点钟，有近千名农民从北面蜂涌而来，个个手持木棍、扁担、铁搭奔向车坊镇大催子史富全的住宅。顿时人人动手，有的跳上屋面扒砖捣瓦，有的忙着搬家具，有的点火烧房，顿时火光冲天，四十多间房子和家具尽被烧毁。催子及其家属四处出逃，其二儿子躲在邻居家里，眼看着房子被烧，也不敢放声大哭。附近警察所里的数名警士看到农民人多势众，只是袖手旁观，不敢轻易干涉。历时一二小时，农民才扬长而去。

葫芦浜催子姚汉良的房子也同样被农民焚毁。胡家荡催子朱静来听到打催子的消息，吓破了胆，就自己动手拆卸房架烧了。

斗争就是生路。事后苏州地主虽下乡抓了二名农民（一名叫徐永春）。但经过抗租斗争狠煞了催子的威风。此后收租不再象以前那样凶狠，稍稍放松一点了。

唯亭农民捣毁警察所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唯亭地区的农田遭受严重的虫灾，粮食基本无收，据现在已八十岁的老人蒋云兰说：“当时我种二亩糯稻，仅收到二百斤谷，一般丰收年景二亩田可收糯谷一千二百斤。”那年，按正常年景收获不到二成。收成不好，农民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一再要求地主派人实地勘察灾情，减成减租。可是勘荒人报荒不准，仍旧是不减一成，强迫交纳，还派出催子、“大叔”、保安队，将欠租佃农拘捕入狱。农民忍无可忍，冒着生命危险走上了斗争道路。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抗租暴动就风起云涌地在唯亭清邱乡的查巷、陆巷、褚巷、吴巷、邓巷（现在划入胜浦乡）爆发了。抗租烈火也波及了近邻的金沙乡三家

村、龙潭、东横港、牛草塘、陈家浜等地。这一带农民相继响应，参加了斗争队伍。

当年一月的一天，约在上午十时光景，南片的农民联合起来，雄赳赳地向远离十二三里的唯亭镇进发。男的手持粗头、铁棒，的女手提饭箩、笕箕，约有一千五六百人，冲上唯亭东大桥，袭击桥堍的警察所（原东城隍庙），手持长枪的二十多个警察，见农民人多势众，悍然开枪威胁。但农民临危不惧，坚持斗争，拒不退却，打得警察抱头鼠窜，保长、乡长也都闻风出逃。

抗租烈火越烧越旺。在抗暴示威过程中，多数村子的农民互相配合与催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运用铁棒扒掉了催子杨家泉的房子，以蒲草加油，烧了南州催子邢正庆的新船。有的痛打催子，拆毁催子的船舫。催子见势不妙，逃的逃，躲的躲，有的半年以后才敢回家。

团结起来是力量。农民与警察相持对抗了一二个钟头，派出代表与警察所长徐松波、雇员汤有会、区长张弘谈判。迫使地主接受了农民减租减成和释放在押农民的要求（保安队逮捕的农民五六人，押解在苏州），农民赢得了胜利。

约在五月，地主迫于形势，只好减收三成，但收到的寥若晨星。不到一个月，被逮捕的人员均释放回来了。抗租的火种也点燃了周围各乡农民的心，郭巷、斜塘的抗租风暴此起彼伏。

斜塘农民与催子斗争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斜塘农田受虫灾为害，低田遭淹，几乎颗粒无收。高田每亩约收 200 斤谷左右。农民生活处于贫困境地，当时催子勘荒不公，报荒不实，交多交少全在他们嘴里，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往往是稻谷快要登场之前，催子就下乡催租，有的还摆帐台，令“大叔”驻地讨租。农民迟交一天就

要给“大叔”贴补一天出差米，连点心费也要强加在农民头上。交不出谷的就被押解到苏州慕家花园的地方吃租米官司。当时有沈仁山、周元明、姚世昌等就被关进了这个冷板房。

这就激起了广大农民的义愤，一场象火山爆发似的打催子暴动就此发生了。农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以滚雪球的方式，鸣锣为号，从北面的小庄村、塘南的宅前村、墩头村、蒋圩村一路过来，成群结队，聚集了近千人。他们砸了鸭盛头催子沈全官的家，推墙倒壁，把房子梁木全部拆下，架在场地上，焚烧净尽。

四月的一个晚上，约在八时左右，从鸭盛头、蒋圩村过来的农民，高举着火把，打着金锣，潮水般地涌来。催子事先获悉上告。苏州警察局派出石队长亲自带领三十多个警察，守住石桥，不准农民过河。因慑于农民暴动的巨大声威，不敢镇压农民，就朝天鸣枪，想驱散农民，农民们并不示弱，一定要过河，最后警察只得让步。

一进墩头村，就有吃着催子苦头的村里人自发地敲着金锣迎接，并指出催子杨厚夫的家宅。接着就包围了杨家屋子，有部分农民还跳上屋面，分工行事，抛砖投瓦。有的拆去稻堆，搬进屋子，点燃焚烧，催子的十多间房子顿时付诸一炬。有的捐着各式农具，扒砖倒墙，敲毁家具，有的把柴草放进船头、船梢，把催子家的船烧得一千二净。催子和他们的家属闻风逃匿。

此后，催子勾结警察，虽然抓走了农民顾品夫，但压不住农民抗租斗争的熊熊烈火。

(上述资料根据当地农民蒋云兰、朱桂兰、沈火泉、
顾金土、张炳熙、王惠良、曹水泉、费掌源等同志
回忆，由杨泉英、袁震访问整理)

有关金家凤的一些情况

上海读者葛蔚平数次来信谈及金家凤的一些情况，现摘登如下：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上海解放日报社出版的《报刊文摘》一〇六期转载贵刊一九八一年第十一期“中共‘一大’以前的党员名单初探”一文，在所列初步考证的五十七位党员名单中，除叶天底及金家凤两人外，其余均列有当时各人的简历。我是金的亲戚，谨向贵刊提供关于上海的党员名单的第十六名金家凤的一些情况，供参考。

金家凤生于一九〇一年，原籍系江苏省吴县角直镇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今吴县角直镇“保圣寺”（国务院重点保护文物）的修建石刻纪念碑上，曾提到金家凤。

金君确系“初探”一文中所称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五十七位党员之一。在中共“一大”召开的上年，即一九二〇年，金君曾托言要留学法国，得到他的亲戚昌舅（注：昌舅者即笔者伯父葛昌鼎）等资助，相当于留学法国十年之费用，总数为六千银元。金将这笔钱捐献为党的经费，对党的成立作出过贡献。

一九二六年冬，曾被统治江苏的军阀孙传芳于南京拘捕，救出后回到家乡吴县角直避难。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吴县县党部又奉命到角直镇拘捕金。幸得同学钱某得讯回乡告金，逃往上海蔡元培先生处，得以幸免。

金君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一日在香港因车祸重伤不治身亡。终年七十八岁。

（原载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党史研究资料》第十二期）

灵岩山下百日烽火

——回忆抗战初期木渎青年的抗日宣传活动

风永益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神圣的全民抗战的炮火在上海打响以后，位于东战场前线的后方吴县广大地区，立即变成了极为重要的战略后方。当时作为吴县第二行政区政府所在地的木渎镇，也成了苏沪两地民众和伤病兵员，避免敌机轰炸较为安全的地区。因此，抗战爆发不久，前方军区即在木渎镇设立了三十二后方医院，在胥口设立了第五重伤医院，从此成批的轻重伤员就由前方转送下来；苏沪两地的失业失学青年和一些避难的老弱妇孺，纷纷逃归家园。他们有的原籍木渎，有的投亲而来。木渎街头，难民成群，素称江南富饶秀丽的风景名胜镇，充满了紧张惶恐的战争气氛。

就在这动荡时刻，“吴县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在苏州成立。隶属于吴县的木渎镇，也由地方各界代表组成了抗敌后援会。设宣传、慰劳、募捐三个组和一个锄奸团，立即开展包括附近乡镇在内的抗日宣传活动，时间虽然只有三个月，但也做了不少教育民众、动员民众和加强军民合作的工作，为后来的长期全民抗战，打击投降妥协，取得最后胜利出了一份力。

这三个月中，宣传方面的工作，做得较有成效。当时汇集在镇上的青年，有风永益、徐茂本、胡振表、吴昔芾、印家铎、张希龄、钱亚霖、蒋鸿翔、郭泰运、吴宗孚、黄裳吉、风永修、钱静秋、赵蕴玉、徐庆和、曹珉、曹璐、姚慕贤等数十人。他们大

部份是失学失业青年，也有青年教师。他们大多是木渎小学先后毕业的同学，都有一颗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心，在苏沪一带接受了进步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思想教育，其中有的还参加了上海“七君子”领导的救国会和其他进步组织活动。在大敌当前，祖国受辱的危急时刻，他们自发地结合在一起，完全无报酬，甚至拿出自己的积蓄作为活动费用，在家乡组成了一支活跃的宣传队伍，并且伸展到胥口、善人桥、石码头、金山浜、横泾、光福、横塘、西跨塘等村镇。他们在当地的小茶馆、晒场、庙宇、学校、耶稣堂、伤兵医院病房开展宣传活动，观众听众少则数十，多则数百人，宣传形式多种多样，有街头剧、讲故事、教救亡歌曲，还演出双簧、评弹、相声等，宣传内容结合当地真人真事，亲切动人。同时还展出大批宣传漫画和有关防空知识的挂图，激发民众的爱国思想和传授防空知识。

宣传组织有时采用小分队，三五个人一组，分头进行；有时集中在镇上的公共场所演出，大部分在木渎小学的大礼堂，以及东街的耶稣堂内，主要观众是伤病兵员。话剧有《放下你的鞭子》、《烙印》、《三江好》、《最后一计》，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慰劳伤兵歌》等。由于演出的现场现景有真实感，因此，不管台上演员还是台下观众，都有切身感受，每场都取得很好的教育效果，终场时总是台上台下高呼口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每场的气氛激昂慷慨。虽然时隔半个世纪，但此情此景，记忆犹新！

宣传组担任主要演员的有凤永益、胡振表、钱亚霖、印家铎、蒋鸿翔、郭泰运、姚慕贤、查慧英等，歌咏指挥、教歌是胡振表，漫画作者是吴昔芾、凤永益，风琴手是徐茂本。

在宣传动员工作的同时，后援会劝募组也作了不少贡献。劝募组在钱静秋、赵蕴玉、郭泰运、严家骏四位青年的通力合作下，

有重点、有计划、有分工地开展劝募工作。东街由郭泰运负责，南街由钱静秋负责，西街由严家骏负责，山塘街由赵蕴玉负责，当时的气候已逐渐转凉，他们劝募重点以寒衣棉被和药品为主。当时镇民由于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动员，对伤病员的处境，非常同情，都慷慨解囊，踊跃捐献，工作相当顺利，捐到的实物很多，有的甚至把新棉被、新毛毯都捐献出来，此外还有日用品、药品、罐头、酱菜等。捐献户不仅是富裕户，也有不少是平民百姓。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人人捐献。这些物品都由慰劳组送进伤兵医院病房，那些伤病员非常感激，纷纷表示伤好病愈后一定要重返抗日战场杀敌报国。

慰劳组由徐茂本负责，属上海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京沪支部。他们配合宣传组为伤病员服务，为他们写信、读报，讲抗日英雄故事，教他们唱救亡歌曲。分布在镇上的病房很多，主要在木渎小学，还有东街茧行、潘正宜米店，山塘街周家祠堂和严家花园，还有城隍庙等处，伤病员最多时有一千多人。伤愈后有重上前线的，伤重的转胥口第五重伤医院治疗，就这样轮番进出，木渎镇成了集散安置伤病员的一个重要的后勤基点。这两个后方医院到木渎沦陷前夕，轻伤兵员步行到苏州，搭上最后一列后撤军车，胥口的重伤病员由胥口分乘大木船九条，于十一月十二日经太湖转入浙江，最后撤到江西的萍乡安源。木渎青年徐茂本、郭泰运、曹珉、程丹娜、吴宗孚、范迪锐等人，随船后撤，后来在江西南昌市与“木渎二区流亡宣传队”凤永益等八人会师，继续投入了赣省抗日救亡的洪流经受锻炼。

经过三个月的宣传动员，木渎镇出现了不少动人事迹。住在山塘街永年庄的吴昔芾，原在上海经商，抗战爆发不久，即返回故乡，立即投入本镇的抗敌宣传工作。为了表示对敌寇的愤慨，他虽然还只三十来岁，即留下胡须，立誓不赶走日寇决不剃去。

后来参加流亡宣传队进入江西、湖南以后，在救亡团体中，青年同志还亲热地呼唤他“胡子伯伯”。他在木渎镇，为了宣传动员镇民挖掘防空洞，除自己带头参加外，还自制宣传牌一块，挂在背上，边敲锣、边宣传，启发民众抗日觉悟。他这次回乡，把全部私蓄留给家属一部分外，大部分用来支援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他在湖南常德一致剧社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十一月以后，前方战事日益紧张，苏州人心惶惶，谣言纷起，眼看木渎镇行将沦陷，在伤病员全部撤走的第二天，宣传组的凤永益、吴昔芾、胡振表、印家铎、钱亚霖、徐滋培、张希龄、俞友清等八人，在下塘“抗敌后援会”的花厅讨论，决定组成“吴县第二区流亡宣传队”，推凤永益为队长，徒步沿公路向江西南昌进发，并随带自行车四辆，除装运行李以外，把在木渎宣传的漫画、挂图以及书报杂志全部装置入箱，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黎明，昂然向灵岩山告别，踏着轻快的步伐，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向无锡方向挺进，开始了行程三千里，历时近半年的艰苦光荣的战斗生涯。

（陈家骅收集）